

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坚持、捍卫和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对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六封书信的探讨

李 静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数字党建与
传统党建融合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5)

摘 要:恩格斯晚年在《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8.5、1890.10.27)》《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9.21-22)》《致弗兰茨·梅林(1893.7.14)》《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1894.1.25)》《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1890.6.5)》等六封书信中,通过全面论述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详细论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及其在研究历史发展和分析历史现象方面的运用,进一步坚持、捍卫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理论内容和辩证精髓。恩格斯晚年的六封书信启示我们,要以高度的党性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要重视给青年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和引导,要深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及其实际运用。

关键词:恩格斯;唯物史观;历史辩证法;坚持发展;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5-0005-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501

恩格斯在晚年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了进一步的科学论述,坚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些经典论述,究竟集中在哪些书信中,国内外学界有不同的见解。大多数人认为,集中在“五封书信”上^{[1]274,117};也有学者将研究集中在“三封书信”上^[2];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将书信研究范围扩大为“12封”^{[1]274}。另有学者认为,应该把恩格斯晚年通信中所有阐述社会历史问题的书信,以及恩格斯给俄国学者丹尼尔逊、给德裔美国政治活动家左尔格、给法国政治活动家拉法格写的书信等,全部纳入研究的范围^[3]。显然,学界对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书信的研究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其原因在于各自研究的对象、内容和视角不同。综合起来,学界对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唯物史观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思想、上层建筑反作用、历史发展合力论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已比较深入,而相对来说,对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唯物史观的发展、运用、影响作用的研究尚显不足。具体来说,从国际上来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马、恩早期的唯物史观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或说是“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更精确的说

收稿日期:2024-10-09

作者简介:李静,女,法学博士,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数字党建与传统党建融合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2&ZD001)。

明”；二是以卢卡奇、柯尔施、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恩格斯晚年的历史观背离、改变了马克思的学说；三是苏联学者，以戈尔什科娃为代表，认为恩格斯晚年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歪曲、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从国内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坚持捍卫和科学发展。公开赞成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较为少见。本文拟以恩格斯直接正面阐述唯物史观的“五封书信”（《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8.5、1890.10.27）》《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9.21-22）》《致弗兰茨·梅林（1893.7.14）》《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1894.1.25）》）为主，加上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1890.6.5）》这封信的思想，并结合新时代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以探讨恩格斯晚年书信对唯物史观的坚持、捍卫和发展及对当代的启示。

一、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问题的提出

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多年后，恩格斯在晚年又通过多封书信详细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这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原理都有自己的世纪。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是回应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19世纪90年代，随着第二国际的创立，欧洲无产阶级队伍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步在工人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不断扩大，唯物史观遭到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以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教授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打着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他们诬蔑马克思把经济因素当作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否定一切观念的力量。同时又提出，思想和人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也有影响，除非证明，这种情况也能从经济上得到论证，那才可以说，一切从根本上都归结为经济因素；否则，只能说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是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因素。资产阶级学者这些拨弄是非、歪曲颠倒历史的观点，竟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理论家以及青年学生中获得了广泛赞同。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施米特就站在巴爾特的立场，写信给恩格斯，希望恩格斯能针对“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影响本身都可以从经济上得到论证”这一点加以说明以支持巴尔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将无法捍卫最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历史观，经济就会不再表现为唯一的推动因素，其他独立的、不是从经济中引申出来的过程就会对经济发展的进程产生影响。而在马克思那里，正是这些产生影响的过程的独立性被说成是一种幻想并且被否定^{[4]137}。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者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搅得十分混乱！尽管梅林批驳和反击了巴尔特关于政治、经济双决定因素的观点，但在激烈的论战中未能给政治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以应有的说明。

另一方面，一些由青年大学生以及一些自诩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们组成的“青年派”，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朋友”，却并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反而醉心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改造”，拿被巴尔特之流歪曲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去教育工人。实际上，跟工人本能地、直接地从现实斗争中获得的认知相比，他们“在工人面前所极力炫耀的‘学识’，还是差得很远的”^{[5]270}。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要加以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6]280}如“青年派”代表恩斯特就把社会发展的物质决定因素论当成了社会宿命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就是完全自动形成的，人像棋子一样受经济关系的摆布。

这些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错误理解，不断地通过青年大学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青年理论家的书信传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不能不放下手头工作，对信件一一做出详尽回复。恩格斯这些在不同时间写给不同对象的信件，表面上看起来似有零散、碎片化之嫌，但实际上，只要将这些问题汇集起来，就成为有严

谨的内在联系的整体。正是这种联系使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得到丰富,更加完备而严整,大大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恩格斯晚年六封书信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一)全面论述经济关系内涵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和捍卫唯物史观基本原则

作为彻底的唯物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将经济关系看作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他们并没有将经济因素视为历史发展“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为什么在多年以后,还是有人把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庸俗化和简单化,理解成机械经济决定论呢?从书信中我们得知,谬误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像巴尔特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蓄意造谣,混淆视听。二是人们对唯物史观理论中“经济关系”这一概念的认识模糊不清。比如,法律哲学系学生博尔吉乌斯写信询问“应该把‘经济关系’理解为什么”^{[4]162}?还有数学系的学生约瑟夫·布洛赫写信向恩格斯请教,“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唯物史观的论点该如何理解^{[4]133}。

针对第一种原因,恩格斯将其斥责为“真是荒唐可笑”,并愤怒地揭露了巴爾特的偷梁换柱的歪曲手法,指出巴尔特“首先制造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6]619}!这些自负的学者们设定一个不存在的论敌去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错误”,这就如同堂·吉珂德同风车搏斗一样使人感到可笑。恩格斯强烈声明马克思和他从没有说过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6]604}。恩格斯还揭露“这些先生们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6]644}。

针对第二种原因,恩格斯在回信中耐心细致地说明了经济关系概念的实际客观内容,以及经济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全面论述了社会历史发展是在经济关系基础上一切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批判了将社会形态演进简单机械地归结为经济原因的公式性谬误,坚持、捍卫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恩格斯首先阐明了经济关系概念的内涵,即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6]648}。恩格斯指出,经济关系是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总和,其中包括技术和种族。因为技术是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是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人是生产力中最基本的要素,种族是人类自身的繁衍,因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6]649}。此外,制约着历史发展的“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6]648}。

在阐明经济关系概念内涵所包含的诸多具体因素之后,恩格斯指出,经济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归根到底的。这里所谓“归根到底”的意思,“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6]649}。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是通过其他因素来间接实现的。

比如,技术“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6]648}。再如,表面上看是思想的发展推动社会发展,其背后的根本动因其实是经济因素。恩格斯指出,经济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意识形态,特别是像距离经济较远的哲学、艺术这样的意识形态,但是经济决定着这些思想材料的改变和它们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这里,恩格斯用“归根到底”这个说法,既反对了历史唯心主义,又反对了庸俗唯物主义,捍卫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二)详细论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特别强调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法

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在坚决捍卫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生产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对参与历史发展的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给予特别的重视。相较于对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恩格斯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不让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被庸俗化和过于简单化,以至于使一些不够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滑向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他通过阐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种不同因素方面复杂辩证的相互作用,特别突出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因素,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思想,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向前推进。

1. 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从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来看,它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所以唯心主义者以为,历史就是意识的产物。正是为了批判这种唯心史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意识形态说成是“虚假”和“幻想”的,并且否定了它们的独立性。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虚假”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层面是指唯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直接从头脑,从幻想的观念出发,以观念代替现实,颠倒了现实和观念的关系,具有虚假性。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152}。所谓的观念史,是依附于人们的物质生活的,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另一个层面是指在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常以普遍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掩盖其内在的剥削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本质,具有虚假性。然而,正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揭露和独立性的否定,一方面为资产阶级把经济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的帽子扣在马克思头上提供了“借口”,另一方面也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人士,既否认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还以为这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为此,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采用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说法,对意识形态理解混乱的问题加以澄清,指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是指其在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条件下形成的独立性。没有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也就不存在。而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对经济发生反向作用。恩格斯还指出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马克思曾提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分工才真正成为分工,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的思想。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精神生产“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6]612}。恩格斯还以国家权力为例,阐述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6]610}。这样,恩格斯用“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两个说法,完善了唯物史观的概念表述,斩断了唯心主义关于意识观念绝对独立性的又一次幻想,将意识形态从思维内部的“虚假独立”中解脱出来,既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又重视了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这不仅反击了巴尔特之流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恶意歪曲,为唯物史观正本清源,而且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

2. 关于上层建筑各种不同因素方面的复杂的辩证的相互作用

为了彻底消除资产阶级反对派蓄意歪曲唯物史观造成的不良影响,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进一步揭

示了人们对唯物史观产生歪曲和误解的根源,即“所有这些先生们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6]614}。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懂得历史辩证法,从而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那么,为什么现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人们会忽视辩证法呢?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当初为了反对唯心主义,不得不更多地强调唯物史观的“唯物”方面,没有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方面以应有的重视。为了纠正这一点,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特别强调了唯物史观中的辩证法。他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各种不同因素方面之间复杂辩证的相互作用的阐释,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思想。

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及其总规律和总结果的宏观角度,恩格斯指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6]609-610}。人类社会历史从总体上看,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的中观角度,恩格斯指出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复杂辩证的相互作用对社会发展影响的重要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并决定着历史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社会历史发展是在经济因素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基础上的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全面地认识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才能把握复杂的社会历史运动。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阐释了社会发展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思想。在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6]649}这样,恩格斯既强调了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又特别突出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当中各种不同具体因素之间的复杂辩证的相互作用,坚持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与唯物主义辩证法形式的有机统一。

从某个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的微观角度,恩格斯提出了上层建筑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在人类现实的具体生活中,很难证明所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结果都来源于经济或仅仅出于经济的原因。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导致某件历史事件的原因,往往是上层建筑中的某一种因素。比如,恩格斯在致布洛赫信中举例说,普鲁士国家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勃兰登堡这个北德意志小邦国的强势崛起,却是由于它卷入了奥地利王室政治斗争,这是政治而非经济的原因。如果非“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语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6]605}。

总之,恩格斯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人类历史的整个伟大发展过程是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没有什么是一切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些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地看待原因和结果的方法即是辩证法的精髓。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对上层建筑各因素相互关系的大量精辟论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确定性,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主观不确定性,统一于伟大的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人类实践中,给唯物史观注入了辩证灵魂。

(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发展和分析历史现象,展示唯物史观的科学应用

恩格斯认为,在经济因素决定作用下的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复杂,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有时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甚至忘掉这种联系,那就很容易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简单地套用于某段历史时期,最后得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后来列宁反复强调“马

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9]700}。

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提供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具体分析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光辉典范。如,在《致约瑟夫·布洛赫》和《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两封信中,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历史发展是在经济因素起第一性作用基础上,一切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指出了历史发展是通过各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必然性,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再如,恩斯特企图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他简单套用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来评论文艺作品,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挪威小资产阶级出生的易卜生能敏锐地发现现代世界的问题。恩格斯则具体分析,认为挪威和德国政治革命历史的不同,导致挪威小资产阶级和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所以尽管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挪威的文艺与德国文艺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意识相互作用的原因,并非经济原因。恩格斯这里指出不能像恩斯特那样,把易卜生这个挪威小资产阶级出身剧作家的剧本中的表现都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然后把自己对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看法硬加在挪威小资产阶级身上。恩格斯通过对挪威文艺作品的具体分析,指明了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各种形式的分析,不能直接从经济中引出,而要去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社会意识和各种形式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要重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要注意艺术、文学等精神生活发展的特点。

三、恩格斯晚年书信的几点启示

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阐释,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多方面启示。

(一)要以高度的党性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是19世纪90年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人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做斗争的重要表现。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高涨时期,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收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枪,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向马克思主义发射暗箭。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9]307}面对这种现象,恩格斯总是“善于及时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和对唯心主义的纵容”^{[9]231},始终以高度的党性予以坚决的斗争。什么是党性?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指出,共产党员坚持党性就是要在思想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就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恩格斯一生就是这样,他晚年仍以高度的党性原则,敏锐地察觉到资产阶级试图从意识形态领域同化无产阶级,消解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意图,在年近七旬高龄且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一边从事着整理和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遗著的繁重工作,一边承担起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艰巨任务,还抽出时间,通过书信方式在思想意识领域同资产阶级作最坚决的斗争,以确保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坚定,保卫已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成果。这种高度的党性原则,对我们今天有极为重要的教育意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社会主义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攻击更加变本加厉,且无所不用其极。更多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反马”和“非马”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严重挑战。面对这种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曾警告说:“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10]23}为此,多数学者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积极投入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斗争,敢于亮剑,及时发声,在讲坛、论坛、网络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批驳性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潮,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主旋律更加响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能量更加彰显。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对错误思潮“不敏感”“不发声”,置身于斗争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无法认清错误思潮可能带来的危害,如像施米特等人一样;二是知识储备不足,有的又急于炫耀,结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与错误思潮同流合污,如像恩斯特那样的“青年派”。恩格斯指出:“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6]599} 三是也有部分学者明明可以识别出错误思想,却因爱惜羽毛,明哲保身,反映出党性意识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10]15} 可见,党性的根本是政治立场问题。我们应以恩格斯为伟大榜样,以高度的党性自觉,“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定维护者、用党的意识形态引导社会思潮的可靠排头兵”^[11],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二)要给青年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引导

从恩格斯晚年书信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青年教育的高度重视。恩格斯晚年书信的对象,大多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青年。恩格斯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给思想迷途中的青年指明方向,这正表明恩格斯非常重视青年,希望纠正他们的错误。而对于巴尔特之流的蓄意歪曲者,恩格斯不予理睬,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因为在恩格斯看来,青年是我们的未来,谁赢得青年,谁就赢得未来。就工人运动来说,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青年学生的思想偏差,比公开的资产阶级攻击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如此,对于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更是如此。列宁曾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全体共产主义青年的基本任务就是学习。恩格斯晚年对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上的教育和引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如当时“社会民主党”一些青年习惯通过二手资料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像施米特、布洛赫、恩斯特、博尔吉乌斯等都是如此。他们向恩格斯提出的问题,都是从二手资料中产生的。恩格斯耐心诚挚地劝导他们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尽管这的确要容易得多。”^{[6]606} 后来恩格斯在给另一位青年的信中也要求他“要研究原著本身”^{[12]200}。这个问题对于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思政教育工作者很重要。我们不仅要引导青年重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本身,不要用二手资料来代替原著学习,而且自己更应该如此。必须指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问题上,正如有专家指出的,“读经典著作不仅是个如何读书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不仅是个读书做学问的问题,还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砥砺和升华的挑战。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导师来说,抓学生研读经典,就抓住了培养学生的关键一环,值得下大力气去研究和引导”^[13]。

另一个方面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恩格斯晚年批评一些青年把“唯物主义”这个词当做一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做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6]599}。这种教条式的做法,如同黑格尔把“观念”当做构造体系的杠杆如出一辙。其结果是“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攻击在他那一圈人中间确实已经退化为套语的东西本身”^{[6]599-600}。恩格斯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6]595} 直到后来恩格斯逝世前不久,还在一封信中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664}。恩格斯提出的要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当做方法,当做“研究工作的指南”,这对于所有青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者具有长期的、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要深刻把握和运用历史辩证法,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科学论证,批判了巴尔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庸俗经

济决定论,澄清了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内的思想混乱。但是在西方实证主义影响下,这种唯经济决定论并没有销声匿迹。恩格斯去世之后百余年来,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一直坚持对其批驳,但“经济决定论”历经第二国际以及西方学者李凯尔特、俄国经济派、波普尔、柯林武德、威廉姆、哈贝马斯等的不断演绎,仍然有一定市场。一定历史时期以来,这种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有严重干扰。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否认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误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成“经济决定论”,有的对其表示不理解、胡乱猜测,有的进行曲解、加以指责,凡此种种,都远离真理。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思想理论领域。二是过分夸大经济的作用。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唯经济建设”,只抓经济,置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于不顾。有的地方甚至靠牺牲精神文明建设来搞物质文明建设。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实际工作领域。出现这两种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已有不少文章做过分析,此不赘述。本文仅从思想方法上做些分析。从思想方法说,上述错误集中到一点,就是形而上学猖獗,不讲历史辩证法。

恩格斯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8]495-496}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如若离开了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必然失去其功能。列宁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也特别重视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他在晚年哲学遗嘱中特别强调:“要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14]652}这说明辩证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基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发挥功能作用的条件。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他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15]321}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重大原则性论断为指导来分析上面指出的错误倾向,即可以清楚地看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作“经济决定论”的错误的实质在于:一是把“经济”视为一种僵化、抽象、孤立的东西,看不到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更看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对立统一关系,看不到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共同构成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错误,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二是形而上学往往是与唯心主义相通的。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本质上也是否认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思想深处难免有把经济建设与上层建筑对立起来,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的问题。一个时期,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口号。

只讲经济建设,忽视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建设的作用,是从另一方面无视辩证法,陷入“经济决定论”泥潭的表现。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对历史辩证法的阐释,特别强调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揭露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和荒谬的科学论断,是对这种错误的有力批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也讲得很多。如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16]。这是很中肯的。众所周知,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具体实践活动中,经济建设的目的和发展方向如何、生产的基本方式和分配的基本方法、经济管理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等问题,经济发展自身并不能够自发解决,而要依靠政治制度、法、意识形态等来帮助推动和解决。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加紧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不断挑起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生物战等,社会主义要赢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当然是最终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能够趁势而上,充分发挥并牢牢把握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动权,通过积极参与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发展,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是革命、建设或改革,若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科学与价值之间的辩证联系,必定导致重大失误。这已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所证明。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学习研究恩格斯晚年在上述书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的科学论证,自然要重视从原著中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装,把握好历史辩证法的原理,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紧密结合我们的历史经验、现实实际,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学习领悟,特别是对于其中所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掌握实际运用的本领,以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参 考 文 献]

- [1] 杨金海,冯章.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5卷[G].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 [2] 陈新夏.恩格斯晚年书信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及其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06):4-9.
- [3] 杨仁厚.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社会思想再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 2018(04):45-50.
- [4] 杨金海,史清竹.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7卷[G].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1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04-01.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 [13] 郝清杰.博士生培养的跨界反思[J],中国高等教育研究,2020(09):9-13.
- [14]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5]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6]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前线,2019(01):4-7.

Engels' s Persistence, Defenda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in His Later Years and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on Engels' s Six Letters ab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Later Years

Li Ji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Key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Party Building
and Traditional Party Building, Hubei Province' s Key Research Bas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Wuhan Hubei 430075, China)

Abstract:In his later years, Engels wrote *To Conrad Schmitt* (1890. 8. 5, 1890. 10. 27), *To Joseph Bloch* (1890. 9. 21-22), *To Franz Merlyn* (1893. 7. 14), *To Walter Borgius* (1894. 1. 25), *To Paul Ernst* (1890. 2. 5) six letter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the decisive role of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reaction of ideology, and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dialectic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monstrating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stud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analyze historical phenomena, It further upheld, defended and developed the basic principles, theoretical content and dialectical ess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ngels' s six letters in his later years have inspired us to consciously safeguard the security of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a high degree of party spirit, to give the youth correct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dialectic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o adhere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china.

Keywords:Friedrich Engels; materialist; historical dialectics; stick to development; modern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左福生 邹柳馨]